

瓦桑/利奥与娜塔莉·戴维斯的双重世界

周兵

在新文化史热潮渐趋平静后,戴维斯探索出进一步推进历史学“去中心”的路径。有学者评价说:她是一个完美的编织匠,把近代早期欧洲的伟人(和不那么著名的普通人)同无数的朋友、同事、学生和世界各地的读者联系在了一起。

2012 年 8 月,多伦多暑热如常,我却在那样一个夏天,感觉如沐春风,这份感受成为我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推荐并翻译本书的缘起。

此去多伦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拜访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

娜塔莉和钱德勒·戴维斯的家是一栋普通的三层红砖小楼,距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和图书馆大约步行 20 分钟。娜塔莉在邮件里细致地为我指示方向,详细到一共要经过多少个街区——15 3/4。在仍然不时被批评者指摘为“过度诠释”和“碎片化”的新文化史中,依据类似这样的细节,可以演绎出许多天马行空的解读:这一定是一条她曾经无数次走过的路线,是从她工作过的大学到家的两点一线;这是一位精研于近代早期历史、对档案文献中的只言片语都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这位历史学家的丈夫恰好又是一位成就不凡的数学家,精确到分数的日常生活难道不正折射了他们严谨、专业的研究精神和毫不妥协的人生态度吗?

随着国内学界对欧美新文化史的关注、介绍、研究与实践的不断展开和深入,我们对娜塔

莉·泽蒙·戴维斯的名字及其作品早已耳熟能详,戴维斯的诸多代表作品已被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也已有不少专题性的研究成果问世,对其史学观念和方法展开讨论,其中既有总体性的评述,更有从某一具体角度切入的分析,如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影视史学、妇女史、法国史、全球史等,不一而足,甚至还有若干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直接以戴维斯本人为研究对象。

在多伦多,与娜塔莉·戴维斯的几次面对面的长谈,令我对其史学观念的理解和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更新。两年多来,为了本书的翻译,我一遍又一遍地细细阅读她的文字,就一些细节的译法与她邮件往来,最后在键盘上把它们敲成一个个中文的字符。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渐渐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史学史的研究者,越来越少地用专业的或“职业的”眼光来检视作为历史学家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和这部被我译作《行者诡道》的著作。

以下,我试着从一名译者和读者的角度,与更多的中文读者分享自己在翻译和阅读这部作品过程中的感悟,以作译序及导读。

译者与读者

在读者手中的这部书里,我有两个身份——译者和读者。

作为中文版的译者,我同书中主人公瓦桑或利奥所处的近代早期地中海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交集,距离他所成长的北非和伊斯兰世界更是遥不可及,备感陌生。但是,翻译的过程却让我通过戴维斯的写作,辗转进入瓦桑的世界。在本书中,戴维斯描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际间的网络关系,她将瓦桑置于这些网络之中,考察他的家族与血统、婚姻与性、教育与职业、见闻与交往、信仰与思想、翻译与写作。其中,她借用伊斯兰教圣训学传统中的“传述世系”,探讨了瓦桑所受的宗教、法学教育及其日后的写作在伊斯兰教学术、思想传承系统中的位置。虽然瓦桑的名字并未出现在伊斯兰/阿拉伯学术的传承序列中,但通过其在意大利的写作和交往,尤其是《地理书》从手抄本到被编辑印刷出版以及不同语言的译本在近代欧洲广为流传,晚近以来,更是随着其手稿的重新发现、研究视角的转移和方法的更新,不断衍生出新的研究和解读。在这个知识传承的世系中,有 1550 年《地理书》意大利文版的编者拉姆西奥,有此后各种欧洲语言译本的译者,有殖民时代的欧洲探险家和奴隶贩子,有重新将瓦桑作品译成阿拉伯语并带回伊斯兰世界的当代摩洛哥历史学家,有把瓦桑作为主人公的小说作家、剧作家和纪录片制作人,也有许多像戴维斯一样关注瓦桑/利奥研究的历史学家,最后还有像我这样再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翻译介绍到其他文化中的翻译者。

戴维斯在本书中专辟一章论述同样作为翻译者的瓦桑,她引述了翁贝托·埃科有关翻译的评论——“翻译不但是语言之间的转化,还是文化之间的互动,译者需要找到合适的词汇才能产生在原文语境中的同样效果。”在此,在文本翻译与诠释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语言转换和文



1518 年,葡萄牙海盗在地中海上抓捕了一位北非外交官——正奉苏丹之命出使土耳其的哈桑·瓦桑。海盗们将他敬献给教皇利奥十世。瓦桑被关押在罗马圣天使

堡。一年多后,他表示愿意皈依基督教。教皇亲自施洗,并为他改名约安尼斯·利奥。

滞留意大利九年的瓦桑/利奥,以基督教世界的欧洲读者为对象,撰写了一部《非洲寰宇地理志》,回忆和记录自己早年出使埃及、土耳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地的见闻经历。这是中世纪欧洲的第一部非洲地理志,出版后风靡一时,甚至塑造了此后数百年间欧洲人对非洲和伊斯兰世界的认识。

化互动,既适用于 500 年前的瓦桑,也适用于今天戴维斯的研究,同样也适用于《行者诡道》这本书的中译。

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深度阅读的过程,任何一位翻译者首先是一个读者,而且是最认真的读者之一。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为对戴维斯著作的补充,我也读了英文版的《非洲记》和阿明·马鲁夫的小说,看了 2011 年英国广播公司沿着瓦桑旅行路线拍摄的纪录片《利奥·阿非利加努斯: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可以发现,这些文本(包括视觉文本)的创作者和诠释者,不论是最初的瓦桑本人,还是以后的编者和译者、小说家、纪录片制作人或是历史学家,他们不但有着各不相同的观点和立场,更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和叙事技巧;由此,他们为文本的读者构建了对瓦桑及其世界的不同认知,即便是同一文本的读者,也会受到各自时代、地域、文化、信仰、政见、教育、性别、种族和阶级等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文本解读上的个体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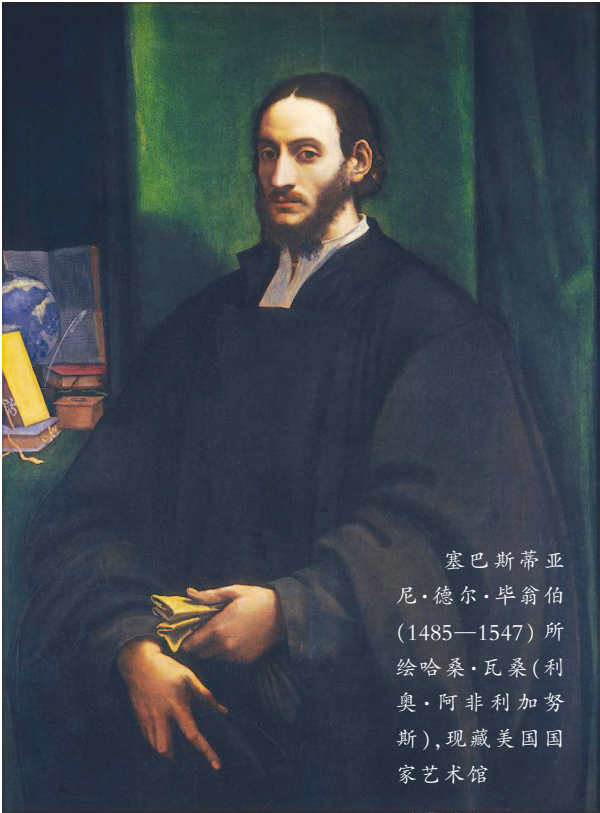
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中,读者并不永远处在被动接受的位置,晚近以来的阅读史研究早已让我们注意到读者在两者关系中的能动作用,在《行者诡道》里,戴维斯不断地提醒我们,瓦桑不仅在身心上处在两个世界的纠结之中,在写作中也无时无刻不得顾及其所要面对的两个不同的读者群体,这些顾虑直接影响到其文本中的内容、结构、文字和观点等各个细节。在瓦桑之后,作为其文本传承序列中的第一个环节,拉姆西奥在编辑手稿、准备出版的过程中,对文本的处理也受到了 16 世纪意

大利读者的宗教观念和阅读习惯的影响,戴维斯在研究中尤其重视比较手抄本与印刷版本之间的差异。甚至于,即使同样是面向欧洲读者的文本,一旦时过境迁,读者对它的认知以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本书中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最后一章的结尾:在 17 世纪的西班牙宗教审查官看来,《地理书》就是一部宣扬伊斯兰教异端思想的“大毒草”,而将它打入另册,列为禁书。

戴维斯将这个插曲醒目地放在书的结尾处,虽未做更进一步的阐发,但其深意似乎是想要唤起读者的共鸣和反思,是作者与读者、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某种互动。

作者与行者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一般讲究追本溯源,强调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及其文本与观念的原创价值和典范意义,挖掘和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思想史也因此常常被描绘成人类历史中的群星闪耀。但是,本书的作者戴维斯却在研究中另辟蹊径,她更加关注文本的传播与接受,对于文本的创造者,则倾向于将他们置于特定时空和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注重他们与外界的互动。思想和观念以文本为载体,自被创造始,便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它们不仅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形式和内容上的改变,更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产生不同程度的重塑。



塞巴斯蒂亚尼·德尔·毕翁伯(1485—1547)所绘哈桑·瓦桑(利奥·阿非利加努斯),现藏美国国家艺术馆